

惠州文史

第九辑

惠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惠州文史

第九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广东省惠州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九年十月

惠州文史

第九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惠州市委员会
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地 址:广东省惠州市行政中心五号楼6楼
邮政编码:516003

开 本:850×1168 32开本 113,000字
出版时间:1999年10月

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:

[99]粤印准字第0077号

封面题字：刘 仑

封面设计：张仲才

主 编：黄松衍

编 辑：朱德尊 魏腾辉 袁 光

特邀编辑：梁大和 叶伟强 陈松耀

目 录

·东坡研究·

苏轼与吴子野 庄义青(1)

《罗浮山历代诗选》中有关苏轼诗

的疑误和篡改 陈 甫(20)

试论苏轼《汲江煎茶》系年及其评析

..... 吴定球(34)

苏东坡曾否到过龙川? 黄 义(47)

·西湖揽胜·

惠州西湖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

..... 吴定贤(60)

古观新姿 玉塔微澜 花洲画阁

..... 梁大和 苗庆庚(70)

烟霞桥 明月湾 碧水关遗址

花洲寻景 泗洲塔下 鳄渚谈古

逍遥堂 月照西新桥 六如亭畔听解禅

留取眠鸥浴鹭天 黄澄钦(82)

佛教圣树菩提树 蓝天照(103)

·史料丛谈·

惠州邮电通信发展简史 林 宽(106)

惠州广播电视发展简史

..... 魏腾辉 袁 光(124)

惠州桥梁的建设和发展

..... 叶伟强 林 宽(138)

建国后惠州经济建设发展概况

..... 陈松耀(156)

近百年来惠州气候变迁 赖兆周(177)

台商投资惠州的回顾 刘 源(185)

陶铸关心惠州二、三事 吴定贤(191)

惠州镇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

..... 李展强(199)

对所谓《黄远贪污案情始末》感言

..... 曾朝明(213)

持平中学第一任校长叶秉樾 ... 叶树模(218)

惠州阜民钱监 王宏宇(222)

惠州沦陷逃难记 吴定贤(228)

渡海解放三门岛之战 郑志强(234)

华侨与抗战的回忆 曾朝明(247)

五十年前的一首战歌——《兜笃将》

..... 郑志强(275)

罗毅民先生传略 罗 全(279)

惠州第一个大学毕业生

——冯邃庵先生事略 吴定贤(299)

解放前惠州妇女头饰 叶伟强(304)

《惠州文史》第一至八辑目录索引 (308)

苏軾与吴子野

庄义青

编者按：苏东坡与吴子野，是极为知己的朋友。他们有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。尤其在东坡贬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时，吴子野都前来看望。在惠、儋两地，两人相处都在三个月以上。故东坡兄弟、父子为吴子野所写诗文、书信不下二十篇。元佑七年，潮州太守派专人求东坡写《韩文公庙碑》，当时吴子野在家乡潮州，东坡在复太守的信中甚赞子野。明嘉靖《广东通志》、《惠州府志》，近人张友仁《惠州西湖志》都有吴子野小传，可见研究苏东坡，自当离不开研究苏东坡与吴子野的交游。此文为我们提供了相当详细的论述，值得一读。

吴子野，原名吴复古，是唐宋潮州八贤之一。其父吴宗统，仁宗嘉佑间任翰林侍讲。当时苏轼刚登进士，正上书朝中各宰执，晋见一些翰苑前辈如欧阳修、梅圣俞等，以求荐拔，因而与宗统有来往。以后，通过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的介绍，对吴子野也有所了解。熙宁十年，两人初次见面便十分契合。以后，随着苏轼政治道路的坎坷蹉跌，他们两人之间的来往和友谊日益密切。仅从《苏文忠公全集》一书中，就可查出两人的晤面聚会近十次，有的聚会时间超过一两个月。苏轼亲笔写给吴子野的书信、诗赋、文辞、墨帖等超过二十篇。最难得的是当苏轼于绍圣四年四月被远贬昌化军（治所在今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）期间，吴子野两次远涉瘴海，千里迢迢，不辞艰险，前往探访，这在苏轼的亲朋知交中是仅有的一人。

大约在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十二月底，也即苏轼贬抵惠州的一个多月后，吴子野儿

子茁仲，即从潮州派专人带书信及酒、面、荔枝、海产品等到惠州慰问。因是初次联系，苏轼在回信中追述与其父吴子野的交往过程说：“某与子野先生游，几二十年矣。始以李六丈待制师中之言，知其为人。李公人豪也，于世少所屈服，独与子野书云：‘白云在天，引领何及？’而子野一见仆，便论出世间法，以长生不死为余事，而以炼气服药为土苴也。仆虽未能行，然喜诵其言。盖尝作《论养生》（编者按：《苏轼文集》篇目中作《问养生》似较恰切）一篇，为子野出也……”^①。这一段文字，道出了吴子野高逸的品格及两人交往的经过。对照苏轼在黄州时写给吴子野信中有“济南境上为别，便至今矣……”^②可知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，即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正、二月间。当时苏轼由知密州以祠部员外郎移知河中府，顺道上京赴任，路经济南，宿其弟苏辙家一个多月，而苏辙刚罢齐州（今山东省济南市）掌书记职而上京

论事。因此，苏轼与吴子野第一次会面，可能有较长时间盘桓。当时朝廷间对新法利弊的争论日趋激烈，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。吴子野是局外人，对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看得较为清楚，出于对朋友的担忧，因而一见面就“论出世间法”，而此法并不是仙家的长生不死，也不是道士的服药炼丹，显然是指思想上的无为和精神上的超脱。身处斗争漩涡的苏轼，此时尚想有所作为，要把自己在地方法上所体察到的某些新法弊病上达朝廷，因此对所谓“出世间法”持一种“保留”态度：“仆虽不能行，然喜诵其言”。而对吴子野的养生论则十分赞赏，为之记录成文，为我们保留了吴氏一份重要思想资料。该文主要内容如下：

余问养生于吴子，得二言焉，曰和曰安。何谓和？曰：子不见天地之为寒暑乎？寒暑之极，至于折胶流金，而物不以为病，其变者微也。寒暑之变，昼与日俱逝，夜与月并

驰，俯仰之间，屡变而人不知者，微之至，和之极也。使此二极者，相寻而狎至，则人之死久矣！

何谓安？曰：我尝自牢山浮海达于淮，遇大风焉，舟中之人，如附于桔槔而与之上下，如蹈车轮而行，反逆眩乱不可止。而我饮食起居如他日。我非有异术也，惟莫与之争而听其所为。故凡病我者，举非物也。……知其生于我也，则虽与之接而不变，安之至也……

吴子，古之静者也。其观于物也，审矣，是以私识其言，而时省观焉。^③

文中积渐而进、顺其自然的观点包含着一些唯物辩证因素，是从现实经验升华出来的哲理，用“安”“和”两个词来概括也颇为准确，因而得到苏轼的赞许与重视。当然其中也包含某些强调主观意念和感觉的成份，与释道的空幻观有相通之处，这一点在苏轼的人生思想中是早已存在着的。可以这么说，

苏、吴两人的初次见面就十分契合，引为同调，成为知己之交了。到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七月“乌台诗案”发生（指当时御史台摭摘苏轼诗文，诬为谤讪朝政、指斥乘輿而兴起的诏狱），苏轼被逮捕入狱，几临死地，百日后被贬置黄州。在黄期间，吴子野曾数次通信慰问，并托人带去一些碑刻、文章、墨帖等，又特地从潮州派专人送上建茗、沙鱼、赤鲤等物给苏轼。从苏轼先后六封回信中我们约略知道吴子野这段期间的概况。如因居父丧在家乡守庐墓三年，又于潮阳直浦都麻田山营建亭园堂庵（岁寒堂、远游庵）暇时教养子弟等等。苏轼有一信赞扬其子说“令子秀才，辱长笺之赐，辞旨清婉，家法凜然，钦味不已。”又赞吴子野建屋宇教子弟的举措，说“此皆古人之事业，仆素所望于子野也”。其中谈到“近日始解畏口慎事，虽已迟，犹胜不悛也。奉寄书简，且告勿入石，至恳至恳。”^④可想见其与子野来往书简文墨数

量不少，故特别嘱咐。

元丰六年四月间，吴子野从潮州起程北上，专程到黄州探望苏轼。而此时苏轼正患严重目疾，风毒攻右目，不能外出，因而子野没有久留，即赴汴京，再次参加省试不第，从此绝意仕途，向家人表示“黄卷尘中非吾业，白云深处是吾家。”遂跟随龙川道士蓝乔，漫游湖海达数年之久，后来苏轼曾在《和陶杂诗十一首》中的第七首赋及此事。

元佑伊始（1086年），朝廷政局又发生变化，高太后听政，起用司马光，苏轼被召回汴京，授翰林学士侍读、龙图阁学士等职衔。但他的某些施政观点与守旧顽固派不同，又遭致攻诘排挤，派系之争，其渐已成，使得苏轼难安于位，要求外放，出任过杭州、颍州、扬州等地知州。就在苏轼由颍州赴任扬州途中，他为潮州人民办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——为新落成的潮州韩文公庙撰写庙碑。这篇碑文，是应潮州知州王涤和以吴子野为

首的潮州士民的请求而写的，是苏轼的一篇力作。为写好这篇文章，他与潮州官民有过多次联系，其往返信函中还涉及一些潮州民情风物，是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
元佑七年八月，苏轼再被召回京，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、侍读学士，守礼部尚书，诏赐对衣、金带和马等物。但在尖锐复杂的新旧党和各派系的斗争中，巨大的荣耀、过份的宠信也必然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和潜在的危机，这在历朝政坛上是屡见不鲜的。元佑八年八月十五日，苏轼在京中为吴子野补撰一篇《北海十二石记》，记述吴子野与李师中、解贰卿等人的友谊及取石过程，说“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，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。”^⑥寓有褒美子野嶷崎性格之意。九月，高太后逝世，哲宗亲政，时局翻变，新党纷纷上台，风波陡起。隔年四月，哲宗改年号为“绍圣”，明白表示与旧党决裂，要继续推行已经蜕变了王安石新法，苏轼在政治上

又一次遭受没顶之灾。四月被贬岭南英州，途中短短十天左右，朝廷竟三改诏令，加重处罚，有“合叙复不得与叙”的条令。五、六月过扬州因遇风而泊舟仪真，又一次遇到了吴子野。这次晤面，就是后来他在惠州寄给吴芑仲信中所提到的“真扬之晤”及“邯郸梦”之譬。可以想见，当时吴子野那几句纯粹道家讽世之言对苏轼的震撼和影响有多大。几个月前，他还是朝廷中最显赫、太后最倚重的近臣之一，三个月间连得两次“对衣金带马”的赏赐，一转眼就跌落尘埃，成为被放逐的犯官，荣华富贵转头空。这不是“虚妄”是什么？不是“梦幻”是什么？只是他对这次政治打击的严重性，估计还十分不足，因而一路上能与朋友唱酬不辍，还吟咏出“暴雨过云聊一快，不妨明月却当空。”^⑦这样借景寓情之句。但没等他到达浔阳江头，八月又传来第四次诏令：“苏轼落左承议郎，责授建昌军司马，惠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

事。”至此，他已完全成为一名被管制的“罪人”，不得不再命次子率其余家人到宜兴田庄，只留下幼子苏过妾侍王朝云同赴惠州。

应该说，苏轼在惠州长达三十个月的贬谪居留，生活上是相当窘困的。岭南地区炎热而多变的气候，对长期居住在北方的老人来说，也不太容易适应。但是我们从他的许多诗文和言谈中，却较少听到沮丧、悲凄的愁叹，而更多看到的是平静、达观有时甚至是潇洒的音容。他是生活在当地官民和朋友们真情的友爱之中。罗浮山的道士、南华寺的高僧，白鹤峰的秀才、村姬以及像吴子野、陆惟忠等随时随处都给予他生活上和感情上以支持慰藉。上文曾经提及，苏轼到惠州不久，吴子野之子芑仲就遣人馈致书信物品。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十一月，吴子野又践约前来惠州晤面。这次作客盘桓，时间长达两个月。在这段期间，苏轼为吴子野撰写了《远游庵铭》及序，手书的《李承晏墨记》